

第三回 中华人在海外——何以西学而能影响中国 何以在基督教新教福音[去]	
目 录	
《中庸》——孔子最重要的著作	
（ERI）陈善长	儒学大师关圣王丘正照述
文而己见：“学术两精”即中生思想分古图中 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	
文史新探	
要重视中学西传	（清）梁启超、梁漱溟、朱熹等(37)
——《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中译本序	张岱年(3)
中国文化属于世界	（清）林则徐、魏源等(37)
——《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中译本序	任继愈(5)
《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导论	[英]葛瑞汉·程德祥等译(8)
楼兰始都争论与 LA 城为西汉楼兰城总论证	黄盛璋(18)
汉学家专页	
二十世纪的学者巨人——李约瑟博士	王国忠(77)
何兹全教授——中国古史研究一家	宁欣(91)
中国文化在世界	
百年来之英译《论语》其一——读西蒙·李新译《论语》	
儒家学说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	柳存仁(109)
瑞典“中国宫”的形成及其风格	杨保筠(129)
	李明(156)

中国：在神话与游记之间——西方人看中国三例

..... [法]柯孟德 孟 华 译(168)

中国思想史研究

张居正与王学关系之考辨 黄卓越(183)

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身体政治学”：特质与涵义

..... 黄俊杰(200)

西方早期汉学史

在华耶稣会传教士杜德美神父致本会洪若翰神父的信

..... 郑德弟 译(221)

耶稣会传教士骆保禄神父致本会苏霖神父的信

..... 郑德弟 译(232)

中国文学

诗歌次序之构建：枚举(赋)新论

..... [美]李德瑞 吴伏生 译(245)

领略古法生新奇——黄庭坚、元祐诗歌高潮与江西诗派

..... 钱志熙(267)

苏轼与僧人、道士

..... 马大品(295)

唐王朝对文学创作的态度

..... [美]戴维·麦克马伦 牛来颖 译(301)

中国古典小说西描述略

..... 周发祥(318)

..... 周发祥(318)

..... 周发祥(318)

中西文化交流史

前伊斯兰时代中亚粟特语和回鹘突厥语基督教文献概述

..... [丹麦]阿斯姆森 陈怀宇 译(345)

利玛窦与文艺复兴

..... [美国]理查德·尼尔·莫顿 陈国洪 杜晓研 “宫廷中”典雅

- [意]彼埃罗·科拉迪尼 耿 犀 译(367)
南怀仁生平家族新考
..... [比利时]瓦列尔·阿里克斯 杨双杨 译(374)
《穷理学》——南怀仁最重要的著作 张西平(382)

汉学研究进展

面向新世纪的瑞典中国研究

- [瑞典]罗多弼 高建平 李 明 译(397)
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研究
..... [荷]许理和 辛 岩 译(429)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黄一农(448)
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趋势
..... [比利时]钟鸣旦 马 琳 译(477)
德国的满学研究 黄淑娟(521)

- 英文目录 辛岩 译(524)
《国际汉学》一、二、三辑目录 (528)
编后记 (534)
《国际汉学》征稿启事 (536)

要重视中学西传 ——《中国的两位哲学家 ——二程兄弟的新儒学》 中译本序^①

□ 张岱年

近百年来，中西学术交流的范围不断扩大，但中西哲学的交流却相对较少。就宋明理学而言，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远不及对其他朝代和对其他方面的研究。然而，宋明理学在西方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例如，美国学者葛瑞汉（A. C. Graham）对于宋代理学家二程的哲学很有研究，撰写了《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一书，对于二程哲学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专著。

英国学者葛瑞汉（A. C. Graham）对于宋代理学家二程的哲学很有研究，撰写了《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一书，对于二程哲学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专著。葛瑞汉先生的《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一书，是继伊川之后，对二程哲学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不仅系统地介绍了二程哲学的基本思想，而且深入探讨了其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揭示了其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该书还对二程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二程哲学与西方哲学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都强调“心”与“理”的关系，都重视“格物致知”的方法论等。该书还对二程哲学与宋代理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二程哲学是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宋代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① 编者按：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先生的名著《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已被程伊川二十九代世孙程德祥先生译为中文，即将作为大象出版社“西方当代汉学名著译丛”之一种出版。现将张岱年、任继愈二先生分别为此书中文版所作的序言连同书的导论一起发表，以飨读者。

三教并尊的政策，儒门比较淡薄。到北宋而理学兴起，程颢、程颐是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他们曾经“出入老释而返于六经”，大力阐扬孔孟的学说，恢复了儒家学说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在理论思维上达到了高于汉唐儒学的水平。

葛瑞汉对于中国哲学的特点有比较深切的理解，他在本书自序中说：“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倾向于：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孤立；整中有分，而不是部分的集合；对立的双方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这个观察是正确的。他又认为：“中国思想史上，有两个伟大的时期，一个是东周战国时期，另一个是宋代。”他高度评价了宋代理学，这也是正确的。

程德祥同志研究二程学，历年所，近将葛瑞汉的《中国的两位哲学家》译成中文，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译文中保留了原书中二程语录的英译文句，藉以显示原作者对于二程语录的了解，这是具有深意的，我表示赞同。我希望这本书对于比较哲学，特别是中西哲学的比较能起推动的作用。

序于北京大学
一九九六年四月

孙来天译（Saul G. O. T.）译取葛氏中
国中下卷，实录修如增音的二程语
录，并《朱熹语类卷之二》——宋平定两
道行言本一卷及《朱熹语类卷之二》
卷之二

孙来天译（Saul G. O. T.）译取葛氏中

① 陈先生对苏轼的《答谢公辟帖》（见《苏轼集》卷之二）对苏轼书信的评价是：“其书信，文字流畅，笔调自然，真乃‘行云流水’，‘出山林之士’。苏轼在给苏辙的信中说：‘近得数帖，皆出超以，流寓绝尘，因故不复作书，亦非所欲。’苏轼这一封信，就是苏轼的‘行云流水’，‘出山林之士’的最好写照。”

中国文化属于世界 ——《中国的两位哲学家 ——二程兄弟的新儒学》 中译本序

□ 任继愈

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所著《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一书,1958年在英国出版,1978年重印。1992年美国再版。他的这部名著治学严谨,言必有据,数十年间在西方研究宋代理学领域内曾遥遥领先,至今还没有能者能超越它。葛氏这部研究二程哲学思想的书是西方公认的研究宋代理学的基本参考文献。

中国文化是世界古老文化之一。中国的典故从《四书》《五经》早已被西方早期来华传教的教士与中国读书人合作译成相应的外文。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多半借助于这些译文的传世。中国文化是几千年一直活着的文化,不像古代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文化曾有过断层的现象。了解中国文化,光了解孔子、老子、颜渊等中庸之道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同样号称为孔子、老子学派的学说,在两千多年的传播和演变中不断发展

变化，已经与原始孔子、老子的学说有了很大的不同。中间经历多次的变化，重大的变革有两次。第一次大变革在汉朝（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第二次在宋朝（公元10—11世纪）。第二次大变革之所以巨大，是因为这时的儒家学说已融入了佛教与道教的某些思想观点，经过吸收、消化，形成了儒家思想的新体系。这个新体系与原始儒家有很大的不同，也可以说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像二程的思想，虽然自称直绍孔孟，但比孔孟的原始思想丰富得多，有些思想是孔孟没有讲过的，有些是改造了佛教、道教的心性修养方法，纳入了自己的体系。宋儒二程是这个新体系的最早建造者。他们提出了以《四书》作为学生的主要教材，实际上是取代儒家以《五经》为主要教材的新变革措施。这一改革到了南宋，经过朱熹的补充和完善，形成儒教，欧美学者称之为“新儒家”，表明经过改革的儒家已不同于先秦儒家，也不同于汉代儒家，它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链接 16世纪以后，中西交通有了新的发展。西方社会已开始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西方更迫切希望了解东方的中国。这时中国的主导思想已不再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而是宋代程朱以后的新儒家。而对新儒家的研究，不同于先秦儒家。西方殖民者所认识的中国，正是他们接触到的受新儒家影响了的中国。

延伸 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思想研究的深入，他们把目光从原始的孔孟转到了宋儒，二程兄弟恰恰是宋儒新体系的奠基者。西方汉学家中，葛瑞汉的成绩较为突出。他的这部研究北宋二程的书自1958年出版以来，在欧美汉学家手中迄今仍占有领先地位，受到同行的重视。该书对二程哲学的重要范畴，如理、气、性、命、心、物等都有较详细的剖析，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该书的某些论点对中国学者也有参考价值。程氏兄弟既属于中华民族，他们创造的精神财富也属于世界人民。研究他们的思想、著作，是

中国学术界的责任，也是世界学术界的重任。葛瑞汉的著作开了一个好头，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外国学者继续下去。

译者程德祥同志对二程全部著作钻研多年，以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继承程门传统为己任，把葛氏著作译为中文。译文忠实，译笔朴实，保持了二程学派的严肃学风。译文中凡涉及程氏原著以及其他中文原著的地方，译者全部查到原著，还原成原文，而没有采取简便翻译的办法。这一工作虽然费时费力，却对广大中国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从中也可以看出程德祥同志对译文认真负责的精神。这部书出版后，也将对中国学术界研究二程哲学思想起着积极的作用。译者拿来译稿，征求我的意见，希望为此书中文版写一篇序。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请求，愿向社会介绍，希望中文版早日与读者见面。

一个新物种在物种之间的斗争中思想家们自己欧洲学者对《圣经》和《新约全书》的译本深信这是上帝的福音。序于北京图书馆上创立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一九九六年五月王德祥的译本在出版前曾于由、限知而熟读。

一个方面是通过传播基督教的神学和道德的而得。特别是由于他的许多杰出的贡献，他成为基督教传播的使者。他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他对于基督教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比中世纪后来的许多其他人物——斯图亚特王室的成员、苏格兰国王、以及许多其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贡献都要大。他被誉为“新教徒的圣人”。虽然他在生前没有被公认为圣人，但后来他被公认为圣人。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仆人，因此从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仆人，而是上帝的仆人。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仆人，而是上帝的仆人。

斯图亚特王室的成员、苏格兰国王、以及许多其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贡献都要大。他被誉为“新教徒的圣人”。虽然他在生前没有被公认为圣人，但后来他被公认为圣人。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仆人，因此从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仆人，而是上帝的仆人。

斯图亚特王室的成员、苏格兰国王、以及许多其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贡献都要大。他被誉为“新教徒的圣人”。虽然他在生前没有被公认为圣人，但后来他被公认为圣人。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仆人，因此从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仆人，而是上帝的仆人。

《中国的两位哲学家 ——二程兄弟的新儒学》导论

□ [英]葛瑞汉

□ 程德祥等译

中国思想史上，有两个伟大的时期。一个是中国思想史上，有两个伟大的时期。一个是东周战国时期（公元前500—前221年），另一个是宋代（公元960—1279年）。

在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相互残杀的连年征战，导致封建旧秩序的崩溃。企图让这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得以恢复统一的努力，产生了许多不同流派的思潮——其中有儒家的实用伦理主义、道家的神秘主义、墨子的博爱学说、杨朱的个人主义、公孙龙的逻辑分析、阴阳五行学派的宇宙论以及法家的法治观等。

战国时期的哲学活动，由于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恢复稳定、封建制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巩固而告终。儒学成了新统治阶级独尊的学说，取代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的所有对手，除道家以外，很快都趋于销声匿迹。

宋代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的产生条件与此完全不同。汉朝确立的儒家官僚政治，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纪才退出政坛。但自公元1世纪起，它就感到佛教蔓延对自身的威胁。儒家指责佛教摈弃忠孝，而忠孝恰恰是中国社会既定秩序的基石。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玄学体系，要比中国向来所知道的任何一种形而上学都更先进。其影响，不久甚至渗透进其对手的思想中。这种形势，最终促使儒家拿出一种能与之抗衡的理论体系来。这股新思潮的动机，是保守的，出于为自己那受到置疑的价值观寻求理性基础的需要。这股思潮向过去周朝儒家经典中去寻求这种理性基础，声称一千年来的儒家经典的原义被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所遮蔽^①。

新儒家对儒家经典的态度，很像中世纪欧洲学者对《圣经》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看法。他们设想自己的使命，不是去创立和发展一种崭新的哲学观，而是去恢复已被世人遗忘了的正宗经典的原义。

然而，这种态度并非与深邃的原创性不相容。特别是由于他们自己设想的可以依靠的权威著作所能提供的自由度，比中世纪

^① 战国时期独立的思想家中，惟一可能对新儒家有所影响的是墨子。虽然他们重复反墨的传统论调，认为爱不能博施而应该遵守人际关系的“等差”。但涉及“仁”时，便有些尴尬，因为新儒家的仁意味着我们与万物同一，这与墨子的兼爱(universal love)差别并不大。韩愈《读墨》篇(《昌黎集》)说墨儒之间并无矛盾。伊川认为“此篇意甚好，但言不谨严，便有不是处”，还评论说：

且孟子言墨子爱其兄之子犹邻之子，墨子书中何尝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于此。
(《遗书》，伊川语)

Mencius says that Mo-tzu loves his elder brother's son no more than his neighbour's son. Where does Mo-tzu say anything of the kind in his book? But Mencius was "pulling up the roots and stopping the source", knowing that as it degenerated the doctrine would certainly be carried to this extreme.

张载曾用墨子兼爱(《张子全书》)一词，于是他的《西铭》被杨时斥为倾向一元论，伊川为之辩解(《伊川文集》)。他们的通信全部收入《张子全书》和《杨龟山集》(42卷本)中。

欧洲学者所能得到的要多得多。

哲学意味浓厚的惟一的一部儒家经典是《易经》(*Book of Changes*)。它是一部运用六十四卦进行占卜的手册。其附录《十翼》(*the Appendices of the Book of Changes*)传统认为是孔子亲手所撰，其实并非如此。《大学》(*Great Learning*)和《中庸》(*Doctrine of the Mean*)，则是从记载礼仪的文集《礼记》(*Book of Rites*)中摘出来的两篇文章。

实际上大多数语录含义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即使是新儒家们所推崇的经典也难免如此。争鸣的各家学派，把他们的新创观念塞进对语录的解释中，极少会有什么困难。

幸运的是，战国时期两位最重要的儒学思想家孟子(公元前4—前3世纪)和荀子(公元前3世纪)的著作，并不在宋初所公认的十二经中。因此，新儒家们可以无拘束地对他们采取更为独立自主的态度，斥荀拥孟。在新儒家的影响下，自宋起，《孟子》(*Mencius*)被列入十三经。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对体系的构筑并不在意。因此，这使得许多欧洲学者弄不明白，如果把他们算作哲学家是否名符其实。在我们看来，最有趣的或许是他们对人生、利己主义及博爱、神秘主义及对政权的崇拜，所表现的种种可能有的态度多得惊人。

然而，宋代的哲学家只表现了单一的态度，即传统儒家的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反对完全向内的精神探索，反对一切对神灵世界和死后之事的探究，坚持认为，人的全部责任是作为社会的一员合乎道德地行事，遵守儒家经典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设定的种种责任规范。宋代新儒学哲学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对人在世界所处位置的这种观点，他们努力用一种统一的世界图景给予描述和阐释，就像佛学那样条理清晰。儒家过去一直以一些相互分离的概念治学，并不觉得有必要说明各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世界和人所遵循的“道”；像君主统治臣民一样，

靠其“命”治理宇宙万物的半人格化的力量——“天”；控制人自身的“心”；人的本始状态的“性”，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而荀子则说“性本恶”等。

宋代新儒学的伟大成就，在于它构筑了一个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所有儒家传统概念都各得其所。所有具体的物，都被视为“气”的变化，由气凝聚而成；道、天、性是“理”的不同侧面，万物依靠理统一起来。

儒学的复兴，至宋代达到顶峰。而这场复兴运动的开端，一般认为始于唐代学者韩愈（公元 768—824 年）。但在前两个世纪里，复兴运动只限于与佛、道的斗争以捍卫儒家经典所体现的价值观。佛、道提倡出世，寻求神秘之悟，而不劝世人作孝子忠臣。

甚至宋初富有战斗精神的儒家，对形而上学也不感兴趣。这些儒家中对即将到来的哲学复兴运动影响最力者，是范仲淹（公元 989—1052 年）和胡瑗（公元 993—1059 年）。同时期稍后，这类学者还有刘牧（在世期公元 1040 年）、邵雍（公元 1011—1077 年）和周敦颐（公元 1017—1073 年），他们正致力于用“太极”说探究宇宙的演变。但是，这些思想家所延续的只是被道家影响过的儒家传统，而唐代的韩愈对道家很反感。这些思想家不关心捍卫正统观念，其探究的数据说是道士陈抟（卒于公元 989 年）所传。

宋代新儒学的特点，是把排斥异端的正统观念和哲学思索相结合。这个特点最初见于洛阳的程颢和程颐兄弟，还有二程父亲的表兄弟陕西关中的张载（公元 1020—1077 年）。

由于我们主要关注二程兄弟的思想，所以对他们的身世，仅略述一下。程颢字伯淳，河南伊阳人，程颐字伯淳，河南伊阳人，程颢长兄，程颐次兄，皆为北宋大学者。程颢生平事迹，因资料不足，甚少记载。著有《伊川集》。

程颐字正叔，河南伊阳人，程颢长兄，程颐次兄，皆为北宋大学者。著有《伊川集》。

作一简要介绍^①。他的同胞兄弟程伊川和程明道合称“伊二程”。其弟伊川于公元 1046—1047 年，二程在周敦颐处学习，但是，没有正式拜师。嗣后，明道攻读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以及佛教和道教，几近十年之久，最后返回儒家正统^②。其弟伊川在京城国子监读书，受到儒家正统学派领袖之一胡瑗的器重。宋仁宗嘉祐（公元 1056—1063 年）初年，二程兄弟在京城首次遇见亲戚张载，当时三人一起参加科举制度的选拔考试。在此之前，张载曾由儒家正统学者范仲淹劝读《中庸》，他和明道一样，年轻时也曾在佛教和道教中游荡过一阵，刚刚返回儒家正统。

公元 1057 年，明道和张载同登进士第，开始仕途生涯^③。伊川则名落孙山，以后潜心学术研究。

一连多年，明道宦海平静，稳步上升。最初，他在陕西胡瑗手下任户县主簿，最后晋升入朝任监察御史（公元 1069—1070 年），据说很得神宗皇帝的赏识。这时改革家王安石正在不顾儒家正

^① 二程的生平，主要源于以下资料：

《明道先生行状》（《伊川文集》），伊川撰于公元 1085 年

《伊川先生年谱》（《遗书》），朱熹撰于公元 1168 年

《程颢传》和《程颐传》，摘自宋《实录》（《琬琰集》）

《宋史》中的二程本传依据上述可靠的资料

《明道先生伯淳墓志铭》（《南阳集》），韩维撰于公元 1085 年

^② 《伊川文集》据韩维《明道先生伯淳墓志铭》（《南阳集》）：

先生于书无所不读，自浮屠、《老子》、《庄》、《列》，莫不思索究极，以知其意，而卒宅于吾圣人之道。

弟子谢显道忆伊川语：

先生少时，多与禅客语，欲观其所学浅深，后来更不同。（《遗书》，伊川语）

（Yi-chuan also）had many conversations with Zen Buddhists in his youth, wishing to observe how profound their learning was; afterwards he gave up these inquiries.

禅宗灵源和尚与某位名叫伊川的人的书信往来和语录收入《灵源和尚笔语》和《禅林宝训》。根据这些材料，林科棠在《宋儒与佛教》中作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程伊川于流放涪州前后，曾从佛教那里取得教诲，这正是他作为儒学大师活动最积极兴盛之时。

朱熹辨析这件事时，指出事实上那人是潘淳，而误作程伊川，“其差谬类如此！”（《朱子语类》）

^③ 《明道文集》。《张子全书》。

统学派的反对推行激进的变法，明道和张载均因抵制新法而被解职。张载返回关中老家首先开展新儒学讲学活动，形成关中学派。而明道继续在王安石治下干了一段外地的小差事（镇宁军节度判官），然后回到洛阳其弟伊川那里。他们像张载一样设馆讲学，从学之徒不绝于馆。两人共同讲道，居洛几近十年^①，直到公元1085年明道逝世（译者注：明道在其他为官地均有一些遗址、遗物、碑刻和资料。如浙江省上元县的“明道书院”，山西省晋城县的“宗程书院”，河南省扶沟县的“大程书院”，河南省汝州市的“春风书院”等）。二程居洛期间与邻居邵雍过往甚密。

宋哲宗（公元1085—1100年）即位后，王安石的新法被废除。潜心学术研究和讲学的伊川未曾担任过任何官职，但在保守派圈内声望很高，布衣被召入朝，为幼年皇帝讲书（官职“侍讲”，公元1086—1087年）。

不久，伊川便辞朝返乡回到洛阳弟子中，此次出山的荣耀没有给他带来福祉。改革派重新得势，他遭到打击。公元1097—1100年期间，他被流放到涪州（译者注：今重庆市涪陵区，现有“点易洞”遗址、遗物、碑刻和资料）。公元1103年，他再次感到威胁将临，便遣散四方弟子，避居深山。不久即与世长辞（公元1107年）。

由于形而上学一直是佛、道独占的禁脔，新儒家被迫从对手那里借得材料，来构筑自己的体系。其中最主要的是，认定在运动变化的大千世界纷杂万象的背后，存在着某种静止的、不变的、单一的东西，人可以在自己的心中发现它。“大”佛教认为，官觉所感知的这个大千世界是虚幻的，通过沉思默想，达到一种禅定的境界才能明白它。据说禅定能使人免却感觉之累。

^① ① 《通书》是二程兄弟对赵普、范仲淹、吕夷简、王旦、王钦若、蔡京、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的著作。

儒学所珍重的不是避世的沉思默想,而是人世间的伦理道德活动。佛教却认为人间尘世只不过是虚幻而已。为了把“万归一”(One behind the Many)的观念改造得适合自己的目的,有必要先把其中所蕴含的神秘主义清除掉,表明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一员,遵循伦理道德规范行事,才能实现自己与世界的一致。

11世纪的各家学派对于根本的“一”,提出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到了12世纪,他们的后继者却又想办法把这两种观点调和起来。

第一种观点是一元论。认为万物皆一,意指万物出于一源,此根源无法觉察而又无时不在,就像地下之泉,溪水从中涌出,四下流散;或者像地下之根,大树从中长出,枝叶繁茂。这种观点与自然神秘主义的某种倾向相联系,道家和禅宗在中国诗画中注入这种倾向。这种观点关注生命力和生长,并且意识到在万物生生不息和我们自己的心灵中,活跃着一种神秘力量。

第二种观点是二元论。它寻求贯穿万物的“一理”(Single Principle),就像木材中的纹理一样,这个理与构成万物的气在本质上不同。这种观点是纯道德的、纯理性的。行动符合道德规范就是理,理由思维活动加以扩展,从已知到未知。

这两种倾向,在中国哲学史上都有相当长的历史。甚至在道家经典《道德经》中,“道”就被设想为一条道路或原则,世界遵循道而运行;而且道是世界从中涌现出来的根源。传统认为《道德经》是老子撰写于公元前6世纪,但很可能是三百年后才成书。

宋初的儒道合流论者把“万归一”设想为一种源泉——“太极”(Supreme Ultimate),万物都从这里生出。他们不回避“静”(stillness)的观点,即放弃现实的活动,退回到自己内在的这种源泉中去。于是,周敦颐声称: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

首批正宗新儒学大师之一张载继续从生长的源泉角度进行思索，虽然他宁愿把这种源泉设想为无限稀薄的气——“太虚”(Supreme Void)。张载认为：

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释于水。

但是，二程兄弟，特别是伊川与这一传统断然决裂，用“理”取代太极。明道尚未觉察出这种观点的变化所蕴含的全部意义，仍然倾向于一元论。其弟伊川提出了一套始终如一的二元论，认定理比构成具体万物的气，不仅仅是更空、更难辨认，而且在本质上也不同。理需要用心觉察，而气则是用感官体察。

兄弟俩认为，理存在于人自身之内，作为其不变的本性，正确的行动就是符合他的本性的行动。

明道认为，一个人可以在自身之内发现道德之理，而不需要被他人所指教。由此看来，他虽然排斥道家“静”的观点，而主张“定”(stability)——动静之中都可以保持定，但他把我们依靠反身自省所发现的根本的“一”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伊川同样与这一传统决裂。他认为，虽然同一理贯穿于自身和外部世界，在我们自身之内，理被那构成自身的气弄得含混不清；因此，比反身自省更好的方法是“格物”，即对外部事物——人或事进行调查研究，去发现其所遵循及应遵循之理。

洛阳的二程学派(亦称洛学)，是后世所有新儒学的始祖。公元1077年张载卒后，关中学派四散，有一些弟子转而投到二程门下。二程的门生乘机宣称，张载学说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得自二程。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本世纪才出现异议。

因此，张载的体系虽然本身很有价值，但对后世新儒学影响不大。而复苏了的周敦颐学说，对后世新儒学的影响却要大得多。11世纪时，周敦颐近乎默默无闻，二程年少时曾拜访过他。12世纪时，他的著作才开始在新儒学后学中流传。在胡宏(公元1106—1161年)的著作中，太极重新出现，与理并存。胡宏曾在二

程弟子侯仲良和杨时(公元 1053—1135 年)处求学。李侗(公元 1093—1163 年)则把太极与理视为同一。李侗曾师从罗从彦(公元 1072—1135 年)。而罗从彦曾在伊川和杨时门下求学。这样根源与理这两个相争的概念结合起来了,虽然太极屈居第二位,哲学的基本概念仍然是理与气。新儒学的根源在于二程,但李侗、朱熹等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李侗的学生朱熹(公元 1130—1200 年),是最著名的新儒家。朱熹用新的哲学观点对儒家经典加以阐释。他注释的《四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选拔官僚的科举考试的必读经书。他的学说获得正统地位,直至公元 1911 年辛亥革命帝制倾覆。尽管朱熹润饰了他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体系,并通过澄清理与气的关系阐明了二元论,探讨了理与太极同一的含义,但他并没有增添任何属于自己的有意义的新东西。在新儒学复兴儒学的运动中,真正有创见的人物是程伊川。如果衡量一位哲学家伟大的尺度是他的贡献的独创性和他的影响大小的话,毫无疑问,程伊川是两千年最伟大的儒学思想家!正如本书所审视的,伊川关于哲学所有基本问题(惟独太极除外)的见解在中国学界从古至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周敦颐是为新儒学做出过贡献的最早的一位思想家,朱熹错误地把他视为新儒学的奠基人,而未能明白他不是一位坚定的儒家,仅仅是一位儒道合流论者,周敦颐的影响只是在二程兄弟卒后才被人感觉到;未能明白除了太极说以外,周敦颐对二程兄弟的哲学体系没有做过任何贡献。二程兄弟年少时有过与周敦颐接触的事实,加上一贯错误地把二程视为张载学说之源的传统,使得朱熹臆断全部新儒学哲学出自周敦颐。12 世纪以来,新儒学内部主要争论的议题是格物。朱熹的

正统学派继承伊川的观点，主张通过研究外部世界来学习道德。但是，陆九渊（公元 1139—1193 年）和后来的王守仁（公元 1472—1529 年）否定这个观点，认为要发现道德之理，只需要省察内心就足够了。他们以一种新形式的一元论，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断言万物皆备于心。这种一元论被格物穷理的正统新儒学学派斥为佛学。

在另一个极端上，戴震（公元 1723—1777 年）主张理只是气的构架，说甚至朱熹也被佛学所污染，因为朱熹把理视为超越气的一种神秘的实体。但是，这两个对立的流派都未能动摇朱熹被官方认可的权威地位，这种地位直至公元 1911 年辛亥革命才告终结。

戴震是清末学者，他与朱熹、王阳明一起并称“宋明三大家”。他的代表作有《孟子字义疏注》、《朱子语类集解》、《卷之二十一》等。戴震对宋明理学持批评态度，他认为朱熹的“理”是空洞无物的，王阳明的“心外无理”更是荒谬绝伦。戴震主张“理在气中”，认为“理”是客观存在的，但“理”不是独立于“气”之外的。他指出：“理者，诚之体也；气者，诚之发也。”他认为，“理”是“诚”的体现，“气”是“诚”的表现。他强调，“理”与“气”是不可分离的，二者相辅相成。戴震还反对程朱理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等禁欲主义观点，主张“性理合一”，认为人性本善，可以通过修养达到“天理”。

王阳明（公元 1472—1529 年），字伯安，号阳明先生，是明朝中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对中国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阳明的学说强调个人内心的反省和实践，认为“良知”是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智慧，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他的学说对儒家传统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楼兰始都争论与 LA 城 为西汉楼兰城总论证

□ 黄盛璋

楼兰始都楼兰城争论症结与本

文目的和希望——代序

楼兰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匈奴传》公元前

176 年匈奴冒顿单于与汉文帝书。《汉书·西

域传》称“楼兰最在东垂，近汉”，是西域诸国位

置最东，也是最靠近汉的绿洲王国，因而和汉

朝的关系从一开始发生关系也最早。楼兰是从东方进入西域的

第一座大门，匈奴为追逐西迁的大月氏进入西

域，大约就在罗布泊东部地区追杀月氏，从而

才能“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

《汉书》称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游牧于天山

山麓及大漠以北。北麓巴里坤湖周围水草丰茂之地，控制以楼兰

城。二程兄弟相争，楼兰居首的西域诸国。汉继匈奴后进入西域，首先

把二程视为先威，就是和匈奴争夺楼兰，由此再五争车师，汉控

出首弱肢脉。制楼兰和车师后，才初步在西域站稳脚步，先

后设立西域都护，开辟兵屯，修筑亭障，利用政

治、军事、交通三结合，保障汉对西域的管治。“沙漠（应正名为“绿洲”）丝绸之路”最早开辟，也是以楼兰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开通，而北道，主要是为了保障军队、使臣、商旅交通安全与供应。可以看出，楼兰是研究西域史的一个入口之处，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但是楼兰国都楼兰城究在何处，却是国际学术界争论多年未获彻底解决的一大难题，争论焦点集中于以下三处：

- (1) 罗布泊西北岸的 LA 城；
- (2) 罗布泊北岸偏东的 LE 城；
- (3) 若羌境内汉鄯善城/扜泥城。

楼兰城与国都问题的争论最初是由 1901 年斯文赫定^① 和 1906 年斯坦因先后在 LA 城^② 发现大批有“楼兰”与“Kroraina”字样的汉文书与佉卢文/楼兰语文书后引起的。佉卢文是文字之名，精研此语的英人布罗提出并称之为楼兰语^③，甚是，下文通用此名。最早经希姆来认为出土地之 LA 城即 Kroraina/楼兰城。斯坦因后确认出 Kroraina 即“楼兰”对译原音，1905 年，沙畹在《魏略西戎传笺证》中曾怀疑 LA 城是否为楼兰，但 1913 年刊布斯坦因所获文书，对这一说法又予以同意。1914 年，王国维《流沙坠简序》继其后提出二证否定 LA 城为楼兰城，但没有交代楼兰城与楼兰国都究在何处，也未知楼兰对译 Kroraina，因当时楼兰语文书尚未解读。沙畹、王国维都没有见到赫定所获文书，王国维更限于斯坦因两次中亚考察所获。斯坦因的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由马伯乐整理，直到 1953 年才出版；特别是赫定所获汉文书中有“楼兰”字样的多达 9 件，有的可以直接解答王氏之疑问，如先见

^① 斯文赫定：《中亚与西藏直到圣城拉萨》(S. A. Hedin, *Central Asia and Tibet towards the Holy City of Lhasa*, Vol. 1, 1903).

^② 斯坦因：《中国沙漠的遗址》(A.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London, 1902).

^③ 布罗：《新疆出土佉卢文书的语言、语法》(T. Burrow, *Language of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istan*, Cambridge, 1937).

到,就可解疑。80年代初由于 LA 城内所采标本的碳 14 测定年代仅为东汉,从而以马雍、孟凡人为代表的一派提出国都不在 LA 城而在托泥,但并不否认 LA 城为楼兰/Kroraina。托泥在南道,是楼兰改名鄯善的国都,不是在北道上的楼兰国都。林梅村在 1995 年第 6 期《文物》上发表《楼兰始都考》又提出 LE 城说,而以 LA 城为注滨城,不是楼兰城/Kroraina 城,将(1)、(3)两说全予否定。

我于 1996 年第 8 期《文物》上发表了《初论楼兰国始都、楼兰城与 LE 城》,否定 LE 城说。楼兰国始都楼兰城究竟在何处,原是下文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而为《文物》篇幅所限。加上前文资料不全,所见不周,故特专写此篇。本文拟全面分析近百年来国内、国际对此问题争论症结,予以排难解纷;系统总结楼兰始都究竟在何处,确认惟一就是 LA 城的各种证据,排除其他各城各说的可能性,最后根据作者几次历史地理考察楼兰古绿洲遗址所获事实,从史前遗迹直至形成以 LA 城为中心的楼兰王国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进行论证,既见树木,也见森林,是补考古之不足与不到之处,尤其在当前不能进行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就更具价值。

楼兰国都、楼兰城是各国学者争论近一个世纪未获统一的问题,国内分歧尤大。为此,我于 1979 年冒不测之危,徒步进入死都 LA 城,并横贯其东西上下。尔后数年,又环绕其周围考察绿洲环境变迁,掌握实地环境第一手资料,此文先将 LA 城与楼兰有关各说的证据与可能等,全予列举,合理分析、充分论证,希望能明辨是非,理清纠葛,为解决这一国际重大争论奠定基础。本文所以不嫌辞费,反复阐明,力求落实,就是为扫除一切可以斩去的纠葛与无谓的扯皮,以扫清研究上的障碍。此文集 30 年研究与实地考察结合而得的结晶,提供当前所能掌握的有关正反两方面各种资料、证据,以求有助于有关争端的最后解决,而这正是许多国家学者共同研究和关心的问题。总之,这是经多次考察、反复修正的全面系统的总结,以前我发表的诸文前后观点不一或有

错误，今后以此文为准。不将一脉分离从“父其命带西来公作书
信件”（D.696）到“带王遣使书信件”（D.697）而将“王遣使书信件”（D.698）归入“王遣使书信件”（D.697）中，是完全错误的。

1. 楼兰语文书中的 Kraina 与 LA 城

楼兰语文书中有 Kraina 的已知有 6 件，两件出自 LA 城，一件出自 LB，确定 Kraina 地位与 LA 城关系的关键证据就是这三件，而皆有争论，故需一一辨明。

(1) Kh.696 号出土于 LAVlii，是 LA 城为 Kraina 的决定性文书，但布罗英译^①、林梅村汉译^②的文字，前后不通，称谓混乱，我参校两译和原文，改正如下：

Vasudeva 谨稟告我亲爱的父亲、伟大的军侯 Bhatiga 腾
下：我从 Kraina 带了 rete 骆驼，已来到此，至今尚无买卖，前
已稟告。我想回 Kraina，您处如有消息，请来信告，您认为
非回来不可时，我要将情况带给您——我的爱父、在 Kraina
的军侯。该县(Avana)之皇家税收已蒙国王陛下恩赐我等。

……问候我爱兄 Bhatisama 好，……(限于印刷条件，楼兰语/
佉卢语文书转写字母上或下附带符号，在此省去)

这是 Vasudeva 自 Kraina 外出某地贸易，而无买卖，想回 Kraina，要其父告知情况，何时必须回去，要其父告知。信中第二人称“您”皆称其父，但其中两句，布罗英译为：“当汝必须去时，余会将它带给余父、楼兰之军侯(gusura)”，分为二人。林译用文言，而称谓不论不类，常不明确所指，此信先称其父为“足下”，而自称“余”，此处亦如英译为：“当汝必须去时，余将彼带给家父、楼兰之军侯”，分为二人，不知究竟说什么？“汝”究竟指谁？谁必须走？

^① 布罗：《新疆出土佉卢文书译文集》(T. Burrow, 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1940, p. 14)。

^② 林梅村：《沙海古卷》，第 313 页，文物出版社，1988 年。

将什么东西带给其父？从而译成一件不通之信。60年代初榎一雄研究此信，利用楼兰语文书对比，对此二句有所解释^①，兹检对原文，参考英译、汉译、日译，改译如上，否则就不知究竟写给谁，无法利用和讨论。此信三处提到 Kroraina 的有：

① Ahu Krorayinade isa agatemi(我从 Krorayina 已到此处)
我 楼兰(从) 此处(到)

② Ahu ichami Krorayina nivartanae(我想回到 Krorayina)
我 想 楼兰 返回

③ Pitu gusurasa Krorayimnammi anisyami(带给在 Krorayina 的
军侯父亲)
父 军侯 楼兰(在) 送给楼兰

第③句用依格后加-m(m)i，表父亲军侯在 Krorayina，而信在 LA 城出土，确定 LA 城就是 Krorayina 城，①、②两句，Vasudeva 从 Krorayina 出外某地贸易，因无买卖想回到 Krorayina，所以必是 Krorayina 城居民，与其父兄一家都在此城即 LA 城，Avana 英译为村，林译为县，是指 Vasudeva 一家住地，是 Krorayina 下一个区，Krorayina 至少比 Avana 高一级，gusura 林译为军侯，鄯善国于 Krorayina 设有军侯，表为军事要镇。

(2) 678 号文书为一田地买卖契。

威德广被、伟大之国王……在位……年，有 Krorayina 人名 Camaka，已居于且末，该 Camaka 将在 Kroraimammi 京城(Mahamta Nagarasa)南边(dachina Sitiyammi)可种三弥里码之耕地卖给 Yapgu，买卖两讫，田契被人从 Yapgu 处盗走，其上书有：Camaka 愿卖，Yapgu 愿买，自即日起，田地归 Yapgu 四子(名略)，拥有产权，抵押、出售或赠送……(任便)(证人、书

^① 榎一雄：《有关楼兰位置的两件法卢文书》，《石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1965 年，第 112—116 页。

写人，已缺失）
 (2) 为重写买卖田契，明确称 Krainaammi 为都城 (Mahamta Nagarasa) 所在，而后用依格 m(m)i，确定都城在 Kraina 同为一处，布罗仅译在后之梵文 Mahamta Nagarasa，意为“伟大的城市”，而丢译其前 Kraina，既不明伟大的城市何指，何在，更不知 Kraina 为都城。60 年代榎一雄首予提出，并确定其为国都，是一个重要发现，但我国马雍、孟凡人与林梅村皆不同意，事关 Kraina、楼兰、鄯善都城及 LA 城的关系，应予辨正如下：

马雍在《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断代问题》中说：“国外学者之所以定此处为鄯善国都，其惟一证据为 678 号文书，与此相反，在文书中，对楼兰和京城使用了不同的词，应表明它们所指不是同一个地方。”^① 所指国外学者就是榎一雄一人，他于 60 年代初先后发表英、日文数篇，反复阐明对于楼兰文书断代、王世、国都等观点，包括 678 号文书都城楼兰^②。马雍此文将 Vasmara 为鄯善王元孟作为自己的发现，自称为断代中“马雍说”。实际上，榎氏早已发表英、日文论文，明确提出这一论点，我一一查对过，史料、证据基本一样，马雍全袭对榎氏早已发表之说，仅将元年 (331/3 年)，称为十一年。文中虽提榎氏断代诸说，却不提他的 Vasmara 为元孟说，与其论证此说文章，这里又仅据布罗英译，不提榎氏发现，因为他反对 LA 城即 Kraina/楼兰城曾是楼兰国都，而主张鄯善国都始终在扱泥城。所以紧接下文他就把它利用到他的主张上：“如果该文的京城指扱泥城，完全可以讲得通”，并解释说，“至于这件文书之所以出土楼兰遗址，那是因为文书的主人是楼兰城人，他自然可以将它带到此地来”，但是 678 号文书明确说“楼兰

^① 《文史》第七辑，中华书局，1979 年，第 91—92 页。

^② 榎一雄：《楼兰国都的位置与佉卢文书的年代》(K. Enoki, *The Location of the Capital of Lou-lan and the Date of Khotan Inscription*, Memo. Res. Dep. of the Toyn-Bunko, No. 22, 1963, pp. 125—191)。见平野道雄著《楼兰佉卢文考释》、《新研片文考释》，转引。

大都京城”，如何能变而为扦泥？荒谬不根之论，实在不足为训。孟凡人同志关于鄯善国都观点全同马雍而加以引申，也是在马氏丢译 Kroraina 的基础上，连梵文“大都”即玄奘“国大都城”，也说成不是国都之意。最后又把卖主 Camaka 与精绝都伯等同见于尼雅所出楼兰语文书，和此件及 Kroraina 没有关系，都牵扯到问题中来。678 号文书根本没有什么都伯，然而他还是说：“但是上述情况也可间接地反映 Camaka 卖地这件事不会发生在楼兰城，678 号简牍很可能是由 Camaka 或 Yapgu(买主)或其他移民带到楼兰城去的”^①，进一步将马文最后误解予以发展。下文只有追根到底才能揭出真相。

678 号出土于 LAIV 区，完全是土著建筑形式，楼兰语文书主要出于此。田契因被盗，因而重写作为其四子所有权证明，LA lvii 即买主 Yapgu 的家始得保管，他就住在 Kroraina 城中，所以愿买城南边 Camaka 之耕地。Kroraina 人 Camaka 是说其原籍，居于且末是说其后移居，所以愿卖原种而现在不可能再耕的田。这一内容明如天日，不管怎样曲解也无法掩住真相 Kroraina/楼兰城是此时鄯善国都，由楼兰语文法钉死，无法拔除。

林梅村过去曾提出两点：(1) Kroramnammi 为梵文单数依格-m(m)i，表国都在 Kroraina，但不是 Kroraina；(2) Kroraina 在楼兰语文书中是鄯善一个州(raya)，如同 Calmadan(且末)、Cadota(精绝)，长官称 Cojhbo(州长)，国都在 Kroraina 是指 Kroraina 州内，但不是楼兰城^②。我遍查后，确知 Kroraina 从不跟 raya，亦无 Cojhbo，此说纯出自造。至于林说(1)项应属歪理诡辩，一则 LA 城以外，都城别无处可依；再则在 LA 城以外较远之地，住在 LA 城内的买主

^① 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年，第 196 页。

^② 林梅村：《佉卢文书释地》，《西北民族研究》1989 年第 1 期，第 174 页。

Yapgu 如何能耕种呢？对此我写过批评^①，现林君已改为：楼兰始都在西距 LA 城 24 公里 LE 城，如此当然也可以改为国都在 LE 城，即楼兰，楼兰不是 LA 城，而属于 Kroraina 州，Kroraina 州治即在 LA 城。如此林文仍可以自圆其说，问题在于 Kroraina 与楼兰是同一的，分为二城，连 LE 城为楼兰城也一同否定，上文已经说了，更重要的是 678 号文书是出土于 LA 城内，而不是出土于 LE 城，如耕地在都城即 LE 城之南，家既住在 LA 城内的 Yapgu 不能耕种，如果说耕地在 Kroraina 南边，不在都城南，请看原文是怎样写的：

Kroraimnammi	Mahamta	Nagarasa	Dach'ina
楼兰(依格)	大	都	南
Sityammi	Bhuma		
边(依格)	田地		

Sitiyammi 后用单数依格，按文法关系，田地在都城南边，而都城又在 Kroraina。分为二城，住在 LA 城不能耕种 LE 城南之田，仍然不行。

(3) Kh. 706 文书出土于 LA 城西北 8.5 英里 LB 佛寺遗址，译文如下：

国王(衔略)谕令御牧(Kori) muldeya 与沙门 Aramda 如下：“朕，伟大国王在 Kroraina，将 Caraka 的庄园赐予 Kamjakara 之 Kalasdhasa，有(一女子名)……从 Caraka 庄园(逃出)，该女子现居于州长 Kapgeya 司土庄园内，当汝接到此泥封契形木牍时，应立即将她从 Kapgeya 庄园内逮捕，务必交 Kalasdhasa 的兄弟 Acila 之手。”

敕令开头一句，布罗英译与林梅村汉译，因 Kroraimnammi 依

^① 抽著《塔里木盆地东缘早期居民、语言、族属与所建立的绿洲王国》，《西域研究》1992 年第 1 期。

格关系理解不同，而有差异，兹将原文转写并注汉字如下：

Maya	Maharayena	Kroraimanammi	Caraka	ni	Gotha
朕(我)	大王	楼兰(依格)	(人名)	的	庄园
Edaga	Kamjakara	Kalasdhasa			
赐予	(职名)	(人名)			

布罗以依格表其前主语名词大王，故译为“朕在楼兰”^①，林梅村则以属其后名词宾语，译为：“朕，伟大的国王曾准将左罗迦在楼兰的庄园赐予该甘者迦罗、迦刺施诺”^②，如依布罗英译，“朕在楼兰”，则楼兰 Kroraina 为鄯善都城在 LA 城，如依林译：“庄园在楼兰，而非王在楼兰。”王究竟在何处呢？楼兰语文书中确称为都城的惟一就是 Kroraina/楼兰，此外扦泥/Khvaniya、Khuhani、Khuvaniya 文书多至 13 件，但既不跟都城，也不跟宫廷，尽管 Kh.530 号敕谕，原文于上奏人苏枯陀及其所在地扦泥/Khvani yammi 前加副词 i'sa/此处，Kh.526 号敕谕与此类似，梗一雄就是凭此一字，而确定王也在此^③。如众周知，印欧语系的“此处”一如英文 there，有时灵活而虚，不一定有多少实际意思，此处指上奏人苏枯陀在此扦泥，并未指王，如王也在扦泥，应有事实证据，否则也是一个“莫须有”(也许有)之事，无以服天下。尽管扦泥是改名鄯善后最早国都所在，马雍、孟凡人都坚持一直在此，并断定楼兰语文书的国都就是扦泥/Khuvaniya，而非 LA 城/楼兰，但未拿出真凭实据。林梅村也一再以 Kh.530 文书扦泥/Kuvayena 作为鄯善国都

^① 斯文赫定：《中亚与西藏直到圣城拉萨》(S. A. Hedin, *Central Asia and Tibet towards the Holy City of Lhasa*, Vol. I, 1903, pp. 141—142)。

^② 林梅村：《沙海古卷》，第 146—147 页。

^③ 梗一雄：《扦泥城与楼兰位置》(K. Enoki, *Yuni Ch'eng and the Site of Lou-lan*, *Uras Altaische Jahrbucher XXXIII*, 1/2, 1961)；《鄯善都城的位置及其移动》，《东方》8—2, 1965 年，第 7—8 页。下文又举 Kh.526 号敕令，也据苏枯陀上奏：大侯鸠陀耶曾于扦泥/Khuhani; yammi; 彼处领取骆驼所食谷物，苏枯陀曾来此处/i'sa，但扦泥前并未加 i'sa/此处，不能证明王在扦泥。

之证，但也未拿出证据，应即据梗氏说，凭楼兰语加 i'sa/此处，如无事实为据，凭文法上的单文孤证，无以服人。我详审 13 件楼兰语记有 Khvaniya 文书，Kh. 478 号为 Vasman 王在位十年，称“由 Khvaniyade/扱泥前来之军侯 Kusanasen……要精绝支付彼等维持生活之谷物”，联系有关文书，特别是 Kh. 5 称他“已于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被带到伟大之皇廷……”应自皇廷派往精绝，任军政长官，但两者相隔多年，如证明扱泥为皇廷所在，还要有他证。目前还只能是悬案。Kh. 706 号谕令中“在楼兰/Kroraimnammi”，文法可以两歧，但上引 Kh. 696 文书中“在 Krorayimwnammi”，也用依格-(m)ni，而表其前的 Pitu gusurasu（父亲军侯）在 Krorayinammi，用法、位置全同。布罗也是以梵文专家而解读楼兰语的第一流权威，至少此句译为“朕在楼兰”并非单文孤证。即使按林译，在“楼兰”的为 Caraka 的庄园，不是“朕在楼兰”，但王将楼兰的庄园赐出后，有女子从园内逃至 LB，王又立即谕令 LB 的僧、俗的官吏将她从州长庄园内捕出交赐者之家，凡此皆因 LA 城去 LB 仅 8.5 英里，而诸事又相连接，只有王皆在楼兰/LA 城才能如此直接、迅速处理，如在远隔沙漠数百里外之扱泥，即使后者扱泥可能为此时的国都，王也不能在此直接、迅速、连续处理这些政务。据此可以推断 Kroraina/楼兰不仅是 LA 城，也是鄯善王曾在此一度发号施令之地，城内 LAⅦ 为大房址，完全为土著建筑形式，规模宏伟，不同一般土著住宅，斯坦因早认为是土人政府，至少可以作为王在此处理政务之地。

Kh. 678 号与此件王名与年月皆残，但此件 Kori muldaya 与 Anamda 分别见于尼雅出土 Kh. 574 与 Kh. 419，为 Amgoda 王三十四年与二十八年，故皆属同一王世，英人布腊夫发现 Amgoda 至十七年王号突变，中加 jitumga，他考为“待中”对音，此年为鄯善王接

受晋代中封号，作为据点，以考订楼兰语文书中五个王年代^①，现虽有几种年代考订，Amgoda 王皆在 3 世纪中叶及以后，亦即林文所定 LE 城早已废弃之后，而实际 LE 城是 LA 城附庸，Kh. 678 号“楼兰都城”与 Kh. 706 号王发号施令都在 Kraina/楼兰，即 LA 城。而 LE 城一件楼兰语文书也不出，所出汉文书又是 LA 城西域长史下行该处公文。从而彻底否定 LE 城为楼兰城说，楼兰城只能是 LA 城。

尼雅古址出土三件：(1) Kh. 370 号为致精绝州长之信，信中称：“我是您的兄弟及亲属，现有数名 Kraina/楼兰人住在我的庄园内，均系我之债务人，他们已于夜间逃往彼处，请予关照。”Kh. 383 号为保管皇家骆驼或死逃的证明书，后有 Korayimci 诸证人已缺，值得注意的是中称此件系据司土 Kumseña 口述所写，Kumseña 就是 LA 出土汉文书楼兰主国的均善那所译之音，是否同为一人尚无确证。(3) Kh. 277 为骆驼账，第二栏首行“Krainammi”表“在楼兰”，以下 2、3、4、5 行皆为两个人名与骆驼一头，皆为在楼兰城住民，此三件至少证明 Kraina/楼兰为鄯善国治下一实用城市。

2. 汉文书中的楼兰与 LA 城

LA 城出土汉文书记“楼兰”的 17 件，其中斯坦因所获有 6 件，赫定所获 9 件，1980 年侯灿等同志又获 1 件。王国维当时仅见斯坦因一、二两次所获，他论定 LA 城为魏晋西域长史治所，因“斯氏于此所得简牍中有书函之检署曰：‘因王督致西域长史张君坐前’，又有出纳簿书上署曰，‘西域长史文书事□(郎)阙□’，一

^① 布腊夫：《三世纪鄯善与佛教史考证》(J. Brough, *Comments on Third Century Shansha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BSOSA XXVIII—3)。

为抵长史之书,一则著长史之属,则西域长史曾驻此地,盖无可疑”,王说今已成为定论。

一、LA 城出土有“楼兰”之汉文书一览表

汉文书原文	出处根据
1. 出 长史白书一封诣敦煌府,蒲书十六封,具(其)十二封 诣敦煌府,二诣酒泉府,二诣王怀,闻顺,秦始六年三 月十五日,□楼兰从掾位马厉付行出书□□孙得成	C107/296
2. 白叔然敬奏,从事王、石二君前,在楼兰	C117/306
3. 六月六日楼兰賈翊马厉再拜白	C15.2/59
4. 张主簿前,八月廿八日楼兰白疏,惶惶恐白,奉辞……无 □(由)亲省,寄心东望……	Ch. 922/469
5. 三月十五日楼兰卑白,尊兄阿□前,别来怅怅,不知所悉	C15.3/60
6. ……楼兰以白	Ch. 909/27
7. 三月一日楼兰白书,济涅白,违旷遂久,思企(念?)委积,奉 十一日书,具承动静,春日和适,伏想御其(体)宜……	C2/34
8. ……言,将朱游私使……羌驴,以为……阿……要务又迫 ……锄好为,还楼兰推……(正)马厉白事(反)	C5.2/39
9. 帅下将薛明言,谨案文书;前至楼兰拜还,守堤兵廉决……	Ch. 754/356
10. 史顺留矣,□□为大涿池深大,又来水少,计月末左右已 达楼兰……	C2/191
11. ……当道诣楼(兰)…	C34/223
12. ……诣楼兰……	M207/562
13. ……疏未请,……楼兰白事,是……	C26.2/134
14. 楼兰耕种(正)(背略)	M227/583
15. 楼兰主国均羌那	M19.7/77
16. 二十二年苦不能(自)致到楼兰□□□解语吾浣衣裳□情 交往,岂当惜不相…	侯 80LB6:7
17. 建兴十八年三月十七日粟□(特)胡、楼□(兰)万石,钱二 百,(正)功曹主簿(反)	Ch. 886/13

但他否定 LA 城为楼兰，证据有二：(1)他所见简牍中言楼兰者凡三，“一曰帐下将薛明言，谨案文书：前至楼兰(拜)还，守堤兵廉决”，此为本地部将奉使至楼兰后所上之书，盖不待言，其二、其三皆有“楼兰白疏”或“楼兰□白”，是“写于楼兰之书信，其书既自楼兰来，则所抵之地不得为楼兰矣，此遗物中之一确证也”；(2)根据《水经注》、两《汉书》、《魏略西戎传》所记楼兰，“皆在罗布泊西北隅，而此城乃在其东北隅，故知其非是”。按 LA 城实在罗布泊西北隅，而非在其东北，王氏所举第二个证据，适反证明 LA 城之为楼兰。至于王氏所举第一证据，实由于当时所见汉文书仅限于斯氏一、二两次所获，现所见有“楼兰”者 17 件，已具列见上表一，其中最为关键者即第(1)条秦始六年楼兰从掾位马厉承办西域长史之白书与簿书，这是楼兰为西域长史驻所的决定性的证据，和 LA 城为西域长史驻所是完全统一的，如王氏当时见到此件，就无法提出 LA 城不是楼兰。表中第(2)条“白叔然敬奏，从事王、石二君前，在楼兰”，这也是书函之封检，等于今天之信封，上书受书者姓名，地址，而加盖封泥，用绳束之。今“石”字下尚有方形凹槽，即纳封泥之处，收信人启封，收留其底函，而弃其无用之封函，不仅其上明确写受书人在楼兰，而又在 LA 城出土，此亦为遗物中之一确证，LA 城铁定为楼兰。第(2)条“从事”为西域长史之属吏，“王石二君”因只有姓而无名，不能知其为谁，但 LA 城出土汉文书大量出现楼兰之西域长史所属官吏与姓名，多至百计，包括多种内容、性质。今据其姓名、职官联系，确定同属于楼兰西域长史，列为表二。王氏当年仅据西域长史文书郎中阙□(适)一件文书，而论定 LA 城为西域长史治所无疑，今查 LA 城有楼兰西域长史属吏文书多至数十，因文书残缺而未联系列表者尚有一半以上，楼兰必为西域长史驻所，与 LA 城必为一地，铁案难移。